

四川大学出版社

■ 下册

外国文学

● 主编 赵继阜 副主编 黄俊祥 杜乐一 林广泽 许忠江

WANGGUO



WENXUE

1586 117

I109
49
2:2

外 国 文 学

下 册

主 编 赵继阜
副主编 黄俊祥 杜乐一
林广泽 许忠江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1988 · 成 都



B 538321

责任编辑：杨 雯

封面设计：李 玫

286

外 国 文 学 下 册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26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06
字数：190千 印数：1—12000册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14-0156-6/I·26 定 价：2.15元

目 录

第七章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续)	(1)
第九节 托尔斯泰	(1)
第十节 契诃夫	(21)
第十一节 马克·吐温	(30)
第八章 20世纪前期文学	(40)
第一节 概述	(40)
第二节 高尔基	(67)
第三节 马雅可夫斯基	(79)
第四节 肖洛霍夫	(90)
第五节 卡夫卡	(101)
第六节 德莱塞	(110)
第七节 海明威	(120)
第八节 福克纳	(129)
第九节 艾略特	(140)
第十节 贝克特	(150)
第十一节 萨特	(159)
第九章 上古东方文学	(169)
第一节 概述	(169)
第二节 《圣经·旧约》	(176)
第三节 迦梨陀娑	(188)

第十章 中古东方文学	(197)
第一节 概述.....	(197)
第二节 紫式部.....	(205)
第三节 《一千零一夜》.....	(217)
第十一章 近代东方文学	(228)
第一节 概述.....	(228)
第二节 泰戈尔.....	(235)
第十二章 现代东方文学	(251)
第一节 概述.....	(251)
第二节 小林多喜二.....	(261)
第三节 川端康成.....	(270)
后记	(286)

第七章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续)

第九节 托尔斯泰

一、生平、思想和创作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柯罗连科说：“思想家托尔斯泰完全寓于艺术家托尔斯泰之中。”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紧密相联，他的创作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思想探索的艺术表现，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50—70年代。

1828年托尔斯泰出生在雅斯那雅·波良纳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早年就丧失父母，童年和少年生活主要是在雅斯那雅·波良纳度过的，从小既受贵族教育，又很熟悉农民生活。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受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1847年退学回到雅斯那雅·波良纳。回家之后，他渴望做一个好的、勤勉的主人，把败落的经济事务整顿就绪，改变农民的贫困处境。但是，他站在贵族地主立场上所进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从而陷入了思索和徬徨之中。

1851年—1854年他自愿在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1852年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完成了自传体中篇小说

《童年》，其后又完成了《少年》（1854）和《青年》（1857）。三部中篇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尼古林卡成长的三个阶段。尼古林卡独特的思想、感情以及经历与托尔斯泰相似，具有自传性的因素，文学家们称之为自传体三部曲。三部曲通过贵族青年尼古林卡的性格形成过程，揭露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同时又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的恶劣影响。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明显地表现出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的写作特点。

托尔斯泰还根据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写成了三篇小说，统称《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9）。在小说中，托尔斯泰真实地描写了战争的本来面目：流血、苦难和死亡，真实地描写了普通士兵的生活和战斗，歌颂他们朴素而悲壮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把士兵与贵族军官加以对照，揭露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自私和怯懦，表现出作者民主主义思想倾向。

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的失败清楚地暴露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落后，改革农奴制的问题已成了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托尔斯泰提出改革方案，把土地租给农民，采用雇用劳动力耕地，但这仍是剥削农民，他心里还是不能平静。《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就是这些社会矛盾和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的艺术再现。

《一个地主的早晨》描写的是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改革及其失败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就象托尔斯泰那样，大学未毕业就回农村，抱着行善的动机，决心改变农民的处境，但农民对他的行动不理解 and 怀疑，主人公站在贵族立场上，在保护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进行点滴改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

悲惨命运及农奴制下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心塑造了一些生动真实的农民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纯朴善良、愚昧落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屠格涅夫说：“这篇故事给人的主要道德上的感受是：只要农奴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有双方的接近和了解，哪怕要求接近的心愿完全无私和极端诚恳。”

托尔斯泰于1857年1月第一次出国旅行，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去探讨俄国的出路，欣赏那在俄国“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社会自由”。他在巴黎赞美莫里哀、博马舍的喜剧，到法兰西学士院听讲演，认为巴黎“有趣而愉快”。

“有社会自由感觉”，但又因看到了公开用断头机对罪犯执行死刑而受震动以致夜不能眠。后来在日内瓦的琉森旅行时，他碰到了一件极能说明资本主义文明虚伪和残忍的事件，这件事促使他写了一篇充满愤怒之情的短篇小说《琉森》。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标榜的“文明”、“自由”、“平等”的虚伪，愤怒谴责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自私与无耻。作品中受嘲弄的穷音乐家，流浪十几年，受尽了阔人们的欺弄，作者愤怒地写道：“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如火如荼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了“你们的共和国狗屁不值”！但是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却是把政治问题归结为精神道德问题，他反对资本主义，同时也否定历史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成就。他批判资本主义，只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观念出发，向永恒的“世界精神”呼吁，认为人只有把“世界精神”作为自己的指导才有出路，只有它是唯一无罪的。小说的结尾，作者号召宽恕

一切，要求拒绝惩罚他自己也谴责过的恶，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新表现。列宁在论及《琉森》时指出：“托尔斯泰宣称：认为‘文明’是幸福，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知识’，它会‘消灭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因此，托尔斯泰向往静止不动的东方制度，向往自然原始的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的文明和虚伪的理性。这种思想在《哥萨克人》中得到充分发挥。

1857年4月托尔斯泰回到俄国。为了认真改变农民的处境，他在农村办教育。为考察西方教育，1860—1861年他第二次出国访问了法、德、意、英、瑞士等地，历时9个月。1863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中的主人公奥列宁同聂赫留朵夫一样，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人物。奥列宁厌倦了莫斯科喧嚣的上流社会，到高加索服役时，去山民中追求纯朴自然的生活。高加索山民的勤劳朴实以及大自然美好的风光令人神往，在这里他爱上了哥萨克姑娘玛丽安卡，并打算放弃贵族身份，作个哥萨克人，但他终于没有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与哥萨克人思想感情格格不入，表现出自私的本性，为山民所鄙弃，最后他只得离开哥萨克，回到上流社会。小说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糜烂生活加以对照，表现作者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奥列宁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思想危机时的苦闷与探索。在小说中首次提出的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后来在《复活》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力图从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以1805年和1820年的

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出了一部表现人民历史作用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的作品。它以反拿破仑战争为中心，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家贵族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开头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

小说的中心思想在于表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肯定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作者以极大的激情描写了“举起人民战争的巨棒”的俄国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的土地和侵略者战斗的英雄气概。在对战争生活的描写时，作者特别突出表现俄国人民对敌人在精神上的优势。普通士兵都理解战争的意义，具有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保卫莫斯科和波罗金诺战役中士气昂扬，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民兵和正规军没有区别，他们穿上洁白的衬衣，准备为国捐躯；商人烧掉自己的商店，不把东西留给法军；农民烧掉饲料，不卖给敌人；在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展开，以勇敢和机智而威名远扬的农民齐抗·谢尔巴退举起斧头战败四个带匕首的敌人；妇女华西里莎杀死几百个法军。莫斯科的大火燃遍全国，俄国人民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小说还塑造了与拿破仑相对立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拿破仑把人民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库图佐夫则热爱人民，接近士兵，善于观察士气，是一个理解人民精神、体现人民意志的英明统帅。作者认为正是库图佐夫这样的统帅和广大人民英勇奋斗，才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托尔斯泰对人民战争的描写有明显的矛盾。他把库图佐夫写成英明统帅，同时又否定杰出人物的作用，把库图佐夫

写成一个事件发展的旁观者；一方面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同时又认为历史和战争没有规律可循，“人类事件的过程是上天决定的”，人民只有盲目顺从天意，人民力量是蜂群式的力量。

与战争场景相映的是对以四大贵族家族为中心的和平场景的描写。作者把贵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首都彼得堡宫廷显贵、追名逐利的将军、官僚。他们在国家危急的关头，仍举办豪华的宴会和跳法国舞，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制造阴谋，进行党派之争；他们公开赞美拿破仑，嘲笑人民的爱国热情；他们以讲法语为荣，对祖国毫无感情。这类贵族中的代表是宫廷贵族瓦西里·库拉金家族。利欲薰心的野心家库拉金，为争夺别竺豪夫伯爵的遗产，明争暗斗，设置圈套。他的女儿爱伦是个没有灵魂的“美丽的动物”、“罪恶的化身”，他的儿子阿拉托尔是个卑鄙无耻的流氓恶棍。

作者在批判和揭露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官僚贵族的同时，理想化地描绘了以罗斯托夫、别竺豪夫、保尔康斯基三家为代表的庄园贵族。他们保持着俄罗斯民族的风尚和淳朴的宗法制观念，他们在精神上接近人民，富于爱国主义精神。这类贵族的中心人物是彼尔和安德烈，他们也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获得新生。这两个人物表现出作者对人生意义和贵族出路的探索，也表现出作者“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1812年卫国战争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歌颂俄国人民英雄品质和俄罗斯民族坚强性格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也反映了托尔斯泰60年代

思想的矛盾和他对于宗法制思想及生活方式的美化。

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农奴制及其旧秩序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这些变化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注意，他的世界观开始出现变化，逐渐由贵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立场。这一切，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列文说：“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这句话实际上是作者对俄国70年代的社会现实的艺术概括。托尔斯泰面对这急剧的变化既感到陌生，又十分惶恐不安，但作者在小说中客观地反映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整个俄国农村和城市一片混乱，古老的俄国宗法制度急剧崩溃，贵族之家迅速破产，自由派地主改变着原来的经营方式，大商人、银行家、铁路大王成了“生活的新主人”。面对着这种急剧变化着的现实，作者在努力进行社会人生的探索。这种探索主要体现在安娜追求个人幸福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情节线索上。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思想解放的贵族妇女，是一个在贵族阶级道德压抑下竭力争取个性解放和爱情的悲剧人物。她具有惊人的美貌，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世界，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渴望获得真正的幸福。然而，安娜的一生却是不幸的。17岁时，她由姑妈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彼得堡显赫官僚卡列宁。卡列宁枯燥乏味，热衷官场应酬，“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安娜是个需要爱情生活的女人，安娜在这种有丈夫却没有爱情的生活里痛苦地熬了8年。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醒了安娜受压抑的沉睡的爱情。安娜大胆而真

诚地爱上了他，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爱情使安娜明白了自己地位的可悲，意识到自己家庭生活的虚伪，认识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在上流社会，尽管妻子欺骗丈夫、丈夫欺骗妻子的事屡见不鲜，但只要表面上维持“体面”，丈夫和妻子保持虚伪的正常关系，就是合乎常规和体统的。安娜不愿过这种虚伪生活，她离开了卡列宁，与渥伦斯基公开同居了。安娜这种不顾“体面”的行为触犯了上流社会，遭到了由“浑然一体”的三个社会集团组成的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攻击。由卡列宁为首的一伙趋炎附势的名利之徒所组成的“政府官僚集团”，用法律、责任拒绝离婚、不准安娜与儿子见面等伪善观念和冷酷措施来折磨安娜。以培脱西·特维斯米娅公爵夫人为中心的、几乎全是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都有情夫情妇的“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不愿意跟安娜一起看戏。以利蒂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由一些阴险恶毒、年轻时都有不少“轰动社交界的恋爱事件”的老妇人和自命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用宗教名义，从安娜手中把儿子夺走，借荒唐的降神术来否定安娜离婚的要求。出于官能享受而“爱过许多的人”的利蒂亚虽年老色衰，还向卡列宁送秋波，唆使卡列宁最后拒绝安娜的离婚要求。

安娜为了追求爱情，失去了儿子、家庭和上流社会的地位，剩下的只有渥伦斯基的爱情了，这是她视之为生命的千方百计要维系的最后一线。可是她所爱非人，渥伦斯基对她的爱情，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安娜认识到，他精神贫乏，不能满足她精神上的要求，他那被安娜理想化了的“蔚蓝色的云雾”消失以后，她感到他身上也有虚伪和欺骗。他

对安娜的美貌逐渐冷淡，同床异梦的孤独终于使安娜感到和他在一起并不幸福，她把爱情献给了完全不值得奉献的人，何况渥伦斯基已遵照母亲的命令与苏络金娜公爵夫人的女儿结婚了。这样，维系安娜生命之线断了，她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是个悲剧。她的悲剧从多方面揭露了俄国农奴制特别是上流社会的腐败，她的自杀就是对贵族阶级及其虚伪道德的血的控诉。安娜对社会的反抗，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可能做到的一切，这种反抗虽是采用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如果说安娜的悲剧，主要表现了作者对腐化堕落的上流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和揭露，那么，列文及其探索，则主要反映了托尔斯泰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精神危机和对70年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探索。

小说中康斯丹丁·列文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作者自传性质。列文是一个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代力图保持“淳朴”宗法制生活方式的贵族代表。列文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乡村，急剧变化的现实，使他忧心忡忡，恐惧不安，因此他力图寻找一条避免资本主义灾难、使人们普遍幸福的道路。一方面他努力进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自奉更勤俭、勤劳，力求纯洁，不谄媚和仰赖别人，亲自和农民一起劳动，亲自料理一切实际事务；另一方面，广泛阅读有关农业的书籍，到处进行有关农事的访问，积极从事地主出土地、农民出劳力、合伙经营、均分红利的改革，即把农民变成经营的股东，借以提高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认为这是一条既不使地主没落、又使农民不贫困，既能抵制资本主义新灾难，又能提高农民积极性的“独特”道路。他的改革理想是

“以人人富裕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互相调合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致遍及全世界”。可是对列文的改革，农民根本没有兴趣，他们“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是除了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这种想在保存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改革的失败使列文陷入悲观绝望境地，甚至想开枪自杀，后来，他倾向宗教感情，否定理性作用，从理想化的宗法制农民费多尔那里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为灵魂而活着”、“记着上帝”、“爱人如己”。列文对于他生活中碰到的许多问题所进行的紧张的探索反映了托尔斯泰从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转变时期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危机。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使作者成为“艺术之神”的著作，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才能，特别是炉火纯青的“心灵辩证法”，多方面地、深入细腻地描写出人物复杂、矛盾、变化着的内心世界，因而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安娜·卡列尼娜》无论思想内容和写作艺术上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联系着托尔斯泰前后两个创作时期。

后期：70年代末80年代以后。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俄国社会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从贵族立场转变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而“勿以暴力抵抗恶”的思想也加强起来。这既表现在《忏悔录》（1879—1882）等一系列的论文中，也表现在《复活》等艺术作品中，还表现在作家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上。作家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否定了我们这个圈子的

生活，我认清了，这并不是生活，这不过是类似生活而已……为了理解生活，我应当去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为了了解人民和接近人民，他经常参观监狱，到法庭听审讯，去新兵收容所，访问贫苦农民，了解他们的思想，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教堂和修道院进行访问，阅读各种宗教哲学著作，并且从宗法制农民立场出发，对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官办教会、官僚阶级、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罪恶都进行猛烈的抨击。当然，作家思想上的矛盾并未消失，旧的矛盾被新的矛盾所代替，这就是对现存制度的猛烈的批判和“勿以暴力抵抗恶”学说之间的矛盾，这是宗法制农民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但是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对托尔斯泰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80年代托尔斯泰写了许多民间故事，还创作了一系列其他作品：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文明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克莱采尔奏鸣曲》（1887—1889）、《恶魔》（1889）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家世界观巨变后新的矛盾。1889年他写了另一著名长篇《复活》。

在最后十年，托尔斯泰继续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托尔斯泰的晚年，生活在痛苦、矛盾、绝望之中。他虽有家长制农民的观点，但他还是生活在贵族的圈子中。他的“救世药方”并没有产生什么预期效果。1910年10月28日，他为彻底摆脱贵族生活，与妻子及家人不告而别，出走南方，11月7日逝世于途中的一个小火车站上。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科学的概括：“一方面，是

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最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

二、《复活》

《复活》从1889—1899年，断断续续写了10年。《复活》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它不仅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名篇，而且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它不仅是托尔斯泰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总结，而且也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总结。

《复活》的情节是简单的。贵族地主少爷聂赫留朵夫公爵诱骗了原是农奴私生女出身的玛丝洛娃，把她遗弃，害得她在社会上走投无路，沦为妓女。十年后玛丝洛娃被诬谋财害命，被捕下狱，出庭受审。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良心发现，忏悔心生，到监狱里去看她，提议跟她结婚，但这一提议不被接受，他四处奔走营救她，没有结果，于是放弃大部田产，和上流社会基本上断绝关系，跟随她去西伯利亚流放地，帮助她从刑事犯队伍转到了政治犯队伍里，使她在那些革命家中得到了归宿，他自己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新生。

小说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沙皇俄国国家机器的罪恶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否定了整个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法庭审判一场是在托尔斯泰这部小说中最有力的篇幅，它以惊人